

胡蘭成 佚文小輯



# 論劉以鬯的生命體驗

王劍叢

男，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香港文學史》、《中華新文學史》等。

朱楚顏

女，中山大學文學碩士，發表過《酒徒與人生》等論文。

也許可以這麼說，劉以鬯的實驗小說是香港最受關注、研究最多、最有爭議的少數文學門類之一，不過，歷來的劉以鬯研究、評論多從作品的創作方法、表現技巧、藝術形式的角度考察評價，我們覺得僅僅從形式技巧的角度來研究劉以鬯是不夠的、欠完整性的，它忽視了劉以鬯小說最主要的審美意義和深層意蘊。筆者擬以作家的生命活動和創作內涵作有機的整合研究，以探討其小說中的生命體驗。而這方面的研究幾乎是空白的。從這一角度切入，其重要性：一是劉以鬯是一位體驗型、情緒型的作家，他的作品溶進了獨特的生命體驗和情緒記憶，愈是在個人感受與生存感知的迷天霧地中，就愈能充分地發揮他的天賦才華與獨特個性。二是文學作品的內容不只是一定客觀現實生活的再現，它還包括著作家對客觀現實生活所蘊涵的某些本質方面的體驗、體察與理性提升。

生命體驗是人在現實活動中與外界事物打交道而獲得的最切身的感受。它不同於經驗，更不同於經歷。經歷僅僅是人的外在生活閱歷，有經歷未必有體驗，體驗則屬於人的內在方面，偏重於思想和內在感情的理性提升。生命體驗也不同於工作體驗、生活體驗。它是與生命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其中不乏認知成分和理性概括，然皆已滲透著情感，深藏

著愛欲，從而體現出人的內在生命的取向。我們覺得劉以鬯是憑個人的天才和感知在創作。其在創作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藝術感知力和藝術表現力，以其獨特的藝術觸鬚去體驗生命、體驗人性、體驗生活，捕捉情感思緒中富有韻致的人、事、物，抒寫現實的人生和自我的情懷，作品極具生命質感。

## 一、劉以鬯小說中的生存體驗

生存問題一直困擾著人類社會。物質生產落後的年代，人們為溫飽而苦苦掙扎，物質生產高度發展之後，人們又為種種的社會問題而焦慮不安，不發達國家的生存困境側重於物質層面，發達國家的生存困境則側重於精神層面。香港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溫飽雖然已經不成問題，但競爭的激烈、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均，自然生態的破壞，西方各種潮流的湧入，使香港的生存環境極為複雜混亂，充滿著各種矛盾。

劉以鬯於一九四八年提著簡單的行李從上海來到香港，長期過著「煮字療饑」的生活，對香港的生存環境十分瞭解，作為懷抱理想，追尋藝術的先行者，他是不願意將自己完全忘掉的，在「娛樂自己」與「娛樂別人」的夾縫中，承受著歷史的負荷和社會的壓力，以自己的敏感與警覺，用實驗性技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不得翻印

有印

有印

有印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不得翻印

巧去體驗生存的甜酸苦辣。

劉以鬯的小說給人的最先印象是一種時隱時現、迷迷茫茫的外觀，它色澤豐富而又景致暗淡，和應著一種蒼茫灰黯、難以梳理的心緒，從這種心態出發，作品極力渲染在商品經濟發達的社會裡，隨著高漲的欲望給人心造成的日益沉重的競爭壓力以及人們為反抗這些壓力而不斷掙扎，展示了香港社會裡人的真實生存狀態，特別是在物欲橫流的病態社會中港人的生存焦慮。長篇小說《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寫香港無業人士生活的困頓。主人公亞洪貧窮、困苦，思想充滿了對錢的渴望，他褲袋裡總是放著一把彈簧刀，多次在腦海中模擬搶劫，一次終於抵制不住物質的引誘，鋌而走險，在一個深夜裡用他那把鋒利的小刀向一對情侶下手。他找到了自己去鋌而走險的理由：一是別人都有膽量做這種事，我為什麼不敢做。二是不該向阿媽拿錢，她很苦，不能增加她的負擔。這就從側面反映出，正是由於亞洪的貧窮與困頓才使他走上犯罪的道路。亞洪「偷與不偷」的思想鬥爭可以反映出一個青年「清醒的痛苦」，從生存環境的惡劣引起自我的失落，從自我的失落又引出對生存方式的不當選擇。

長篇小說《島與半島》全面展現了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的社會生活，著重描寫主人公沙凡一家及其朋友們的生存狀態，沙凡的老朋友杭占雨，把一筆退休金投入炒股，在股市的波濤洶湧中，經受不了打擊而心臟病猝發，成為數十萬因股市急遽下降的受害者之一。沙凡太太因為通貨膨脹，大量買進高價的冒牌廁紙，由於制水期儲水之用而購買過多的水桶，最後全當垃圾處理；因經濟的持續衰退，公司不是裁員就是減薪，為了保住飯碗，經理生日時，沙凡硬著頭皮，向總經理送禮，最後還是逃脫不了被解雇的悲慘命運。作品最後寫沙凡的女兒沙娟做了一場噩夢，夢見香港發生了驚心動魄的大地震，「地殼裂開時，房屋、車

子、樹木、人、畜生……同時跌入裂開的罅隙。從山望下去，那裂開的罅隙就是可怕的深淵。」這場奇妙的夢折射了人們在時代騷動之中所造成的心理恐慌。劉以鬯把轉型期的香港市民歷盡劫難，在變化莫測的畸形社會裡的焦慮、恐怖和困惑的生存體驗澆灌在人物身上。

六七十年的工業化使香港成為一個繁榮的大都市，香港都市化的進程使香港人與社會存在方式發生了一次巨大變更，這種變更既是落後向先進的過渡，也是自然向人工的過渡，都市化給社會帶來了進步，也給人類帶來了畸變，「大都市始終是金錢經濟的地盤。」金錢具有一種適用於世間萬物的共性：它要求交換價值。它把所有的人格和品質都簡化為一個問題：「值多少錢？」（1）都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金錢面前顯得尤為明顯。這是一個金錢主宰一切的社會生存環境，反映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冷漠的、絕情的。《鏈》是由十個人物的生活片斷所組成，作品描寫了他們瞬間平淡的生活，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愛好與追求，大家只對與自身利益相關的事情關心，而很少去關心別人的生活，他們生活在熙熙攘攘而又空空蕩蕩的社會裡，他們互相之間似乎毫不相干，陌路相逢，只不過是在某一時刻某一場合不經意地湊合在同一空間裡。

《天堂與地獄》借一隻蒼蠅的眼睛，通過三千元由徐娘、小白臉、妓女、大胖子轉一周的描寫，典型地揭示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金錢關係。《一個月薪水》也一樣反映香港社會的人情世故的淡漠。情節很簡單，寫主人公馬文滔在妻子的威懾下，辭去養育他成長、在他家服務了四十三年老傭人的故事。妻子是董事長的女兒，馬文滔在經濟上受到太太的制約，當妻子覺得二婆已沒什麼利用價值時，便辭退她，馬文滔不敢反對，多給二婆一個月薪水將她逐出家門。這是人的生存現狀，也是扭曲、腐蝕人的靈魂的生存環境。

從這些人物的生活片斷中，讓我們覺得劉以鬯對生存的體驗是凝重的，



這樣的生存環境只能讓他感慨於眼前的生活，寫悲歌，寫牢騷，於苦澀中顯得無奈。

英國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表面上採取的是積極「不干預」政策，但實際上根本無法反映殖民政策下人民的自主意識，也無法探討民族意識缺乏的原因，在商業規律的支配下，人們更多的是陷入彷徨與迷惘中。倘若加上政治問題的滲入，這種心緒就更為突出。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一九九七年，香港要結束它的殖民地處境，回歸祖國，某些人對一九九七年後，香港將要實行的方針、政策不瞭解，缺乏信心，所以「九七問題」就引起不同階層的人的疑慮與不安。作者在小說《一九九七》中就對這種心態作了深刻的表現。小說主角呂世強為偷渡客，經過十多年的拼搏晉升為中產階段，因股票忽漲忽跌，使他受到相當大的損失，因此怕香港驟變，世強並非巨富，但有兩個家，同時愛著兩個女人，其中二奶是不合法的，沒有資格移民，這問題使他非常痛苦，作品中一再渲染呂世強的生存焦慮，這一思緒猶如一條無形的繩索，緊緊地捆綁著他，並逐步升級，他見到「將來香港九龍新界一如深圳成為特區」這個大字標題，就大發脾氣，後來的情形更是每況愈下，留香港與移民外國的問題始終困擾著他，繼續留在香港，又怕香港情況有變，移民國外又不能帶走二奶，而他對二奶又非常愛，這使他痛苦萬分，憂心忡忡，不得安寧，經常做惡夢。過分對香港回歸的恐懼使他幾乎連樂趣也失去，意識被恐慌所佔據，心情惡劣，終於有一天酩酊大醉中死於車禍。作品中作者將這種生存體驗藝術化地借呂世強的形象表現出來。

《酒徒》中的酒徒是個職業作家。作品多次展示酒徒的彷徨與迷惘，寫他夢見中了馬票。弗洛伊德認為夢是願望的達成，他貧困潦倒，身無分文，夢見中了馬票，有錢了，便可報復曾看不起他的人，從而獲得一

種心理上的滿足，精神上的勝利。作品在迷惘混沌的夢境中描述酒徒潛藏深處的痛苦失望的現實困境，無法自拔的艱難處境而產生麻醉自己的夢境。

對人的生存處境的關注在劉以鬯的小說中並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而是貫穿在他整個創作中的深層意蘊，這是劉以鬯創作的主導精神，在作品中令人怦然心動的已不是作者對香港歷史的複製，而是作者對人的生存體驗的呈現。

## 二、劉以鬯小說中的人生體驗

人生體驗是一種從生活中來的活生生的對人生的思考。其中交織著思辯認知的成分和實踐的成分，在人的心靈活動中呈現為印象、情緒、意念及理智感悟。生命在經歷著，也在體驗著，劉以鬯用一雙敏銳的眼睛，凝視著這經歷著的人生，他從現代人的人生感受出發，對人的命運和生活方式進行追問和探詢，同時也思考著如何做人，要做一個怎樣的人的問題。

劉以鬯在創作中，一方面悉心把作品中的人和事納入人生的軌道，另一方面，又從這些人事中超逸出來，與讀者一道品嘗人生況味，揭示命運的偶然性和不可捉摸性。《打錯了》是短篇小說，它採取相同人事、迥異結局的平行參差結構。全文不足兩千字，小說分兩部分，同一人物，同一情景，第一部分他被巴士輾成肉醬。第二部分寫他回家接了一個打錯了的電話，延長了一會兒時間，便避免了一場災禍，作品揭示了人的命運往往不由人掌握，有偶然性因素。根據這篇小說文末的注釋「是日報載太古城巴士站發生死亡車禍」，從此可以推斷作者是因這一車禍而生感喟，由這一感喟而激發創作靈感。他感慨人生命運的不可捉摸，人生禍福往往決定於偶然的瞬間，閱後讓人想到偶然性與必然性之間的聯繫。我們知道，世界一切現象往往處於複雜的因果迴圈中；任何事物或事象的產生，偶然性的東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又如《夕陽》寫的是一個妓女病重，他丈夫為了籌錢交醫藥費，鋌而走險，擊昏了一個路人，搶了他的錢，後來才發覺這個路人是趕來醫治他妻子的醫生。結果，他的妻子因為醫生來遲了，返魂無術。這樣的結局讓人驚愕，也讓人覺得人的命運實在是難以揣摸，假如丈夫不去搶錢，假如丈夫要搶的那個人不是醫生，結果將會改變，但這只不過是一個假設，命運就是愛捉弄人，讓你無法預測，無法控制。劉以鬯在作品中試圖探討命運與際遇，命運將人的一生套牢，人在命運面前顯得渺小，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人，也做不了環境的主人。讓人感到人生的虛無。不過作者的這類作品雖然探討了命運的某些本真的東西，但未免顯得被動消極、聽天由命。

從第一聲啼哭開始，我們每個人就開始了自己的一生，開始踏上自己命運的旅程，也開始意識到一個重大的課題：人生，何為人生，人的一生活怎樣活才有意義，有價值？司馬遷的千古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給了我們很大的啟迪。有些人用不正當的手段發財成了富翁，壽命雖長，但這樣的人生沒有意義，如行屍走肉；有些人壽命雖短，但是為社會的進步，人類的解放而獻出自己的生命，這種人雖死猶生，他的精神永存，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劉以鬯雖然認為人是無法掌握命運的，無法與命運抗爭的，但他又主張盡力去做應該做的事，以理智的態度去對待命運，他試圖在作品中積極探索如何做人？做一個怎麼樣的人才是有意義的生命論題。

劉以鬯在《酒徒》中就探討了要做一個怎麼樣的作家的問題。酒徒雖為生活所迫為報刊寫武打和黃色小說，但他感到很痛苦，常受良心的譴責，「一個文藝愛好者忽然放棄了嚴肅文學的工作去撰寫黃色文字，等於一個良家婦女忽然背棄觀念到外邊去做了一件不可告人的事情。」於是他常常下決心戒酒，停止寫這種東西，「如果繼續撰寫黃色文字，

受害的是廣大讀者群。」他知道創作危害社會的作品不是一個正直的作家。但他又感到，抵抗的結果只是和自己過不去，「現在，連喝酒的錢都快沒有了，繼續下去，終有一天要睡在街邊，吃西北風。」他就這樣欲罷不能，停而復始。

同時劉以鬯在作品中還塑造了一個勇敢地面對現實，矢志追求理想，進行嚴肅文學創作的進步青年——麥荷門的形象。他把母親辛苦積蓄的錢拿來出版《前衛文學》儘管麥荷門自己也知道這本雜誌不會久長，不過，他認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使力量薄弱，只要能夠將水準真正提高，將來會結成什麼樣的花朵，誰也無法預料，他想與這個社會抗爭，作者在作品中通過麥荷門寫給酒徒的信，強調了作家的良知職責與作品的靈魂的融合。回答了要做一個怎麼樣的作家才是有意義的問題。

一位真正的作家，必然是生活在自己所追求的、崇高的理想世界裡，劉以鬯在作品中是用批判的眼光來寫酒徒的，通過對人物的評述，對當今文壇的是非黑白，給予了正義的判斷。創作主體在文中用醜陋的蜘蛛在不知疲憊地織網來象徵在香港要從事嚴肅文學的艱辛，他探索出要通達一個燦爛的人生就要不受困擾不辭勞苦地從事嚴肅文學創作，創作要勇往直前，義無反顧。

《露意莎》是劉以鬯在抗戰時期創作的小說，寫愛國志士在「孤島」淪陷後的英勇行為，其中的「午夜」表演女郎露意莎，因為母親抗拒日本兵的侵害而犧牲在侵略者的刺刀下，因而對日本侵略者有著深仇大恨，後成為地下工作者；露意莎為了擋住要射向抗日分子的子彈而壯烈犧牲了，臨死時的一句話讓人敬佩，「去吧，到大後方去幫助你的祖國趕走暴虐的侵略者。」充分表現了抗日戰爭時期年輕一代的愛國激情。露意莎只是一個午夜舞臺女郎，她將世界的苦難置於生命之上，為了世界的和平，為了擊敗侵略者，她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雖然她的生命是短暫的，但她的精神、她的風範是永存



的，作者是帶著讚揚的態度來寫露意莎的，這樣的人生才是可歌可泣的、有意義的人生。

保爾說過，「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於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回首往事，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臨終之際，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sup>(2)</sup>劉以鬯在作品中對命運與人生進行了嚴肅的思考，體驗是深刻的，藝術表現是獨特的，反映在作品中，其褒貶態度極為鮮明。

### 三、劉以鬯小說中的人性體驗

自古以來，人們對於人性的認識就頗多分歧，有關的爭論至今仍然存在，如性善論、性惡論、善惡混論之間的爭論。古代的儒家認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也就是說人的本性本來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這種本性是相近的，帶有普遍性的，只是因為後天生活習慣和環境的變化，才造成了人性的變異，荀子提出了性惡論，認為人性是惡的，人都有好利、好聲色的情欲。劉以鬯認為，雖然人的本性是善的，但人仍存在某些心理缺陷，或在不同的環境、社會經歷中產生不同的生活動機，從而時常進行善與惡的鬥爭，人性不會獨善或獨惡，人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也會善惡共存的，人性是複雜的。

香港學者也斯認為劉以鬯的小說「不在技巧的實驗，而在那種透視現實的精神。」<sup>(3)</sup>的確，劉以鬯的小說大多是在積極探索人的內在真實，為我們開闢了一個五光十色的複雜心靈空間。他非常注意反映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對於純潔人性的挑戰和考驗以及在這些挑戰和考驗下人性弱點的流露；在五光十色的社會萬花筒中，他把筆觸伸向了包括友情、親情、愛情以及真與偽、善與惡、美與醜等等在內的開闊的

人性界域，在那裡展開了大膽的發掘和細緻的雕鏤，用其深邃的內在質詢展現人性的複雜性。

《寺內》寫張生與崔鶯鶯的愛情故事，作品取材於《西廂記》，劉以鬯對這個故事進行再創造時，著重思考的是老夫人的個性，作品寫孫飛虎圍攻普救寺，要崔鶯鶯做壓寨夫人，老夫人為解困，承諾「不論僧或俗，能退賊兵的，就將鶯鶯嫁給他。」當張生將賊兵解圍後，老夫人卻不守諾言了，她不同意把女兒嫁給一個沒有功名的書生，這是一個勢利、不守諾言的老夫人。另一方面，老夫人對張生與崔鶯鶯的愛情進行壓制，但自己卻背叛了相國門

的道德教育；在夢中「她見到了自己與那個年輕的男人睡在一起。而那個年輕人竟是張君瑞。」她絲毫不羞愧，原本捍衛相國府道德的老夫人在夢中顛覆了自己現實中的角色，「努力禁欲的結果，反而使性本能特有的執拗性和反抗性充分展示出來。」<sup>(4)</sup>有關老婦人人性的描寫是原著最薄弱的環節，作者從其年紀（約三十多歲）、人的性本能出發，揭示了老夫人平常所表現出的行為言談的不真實性，思考了她被封建道德掩蓋的一面，體現了劉以鬯對人性體驗的深刻性。

《蜘蛛精》是取材於我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遊記》，故事主體是當年唐僧在盤絲洞遇見女妖精那一段。在原著或在普通讀者的心目中，唐僧一向是德高望重、循規蹈矩的「聖僧」，他那「守身如玉」的個性在古老的東方是魅力無窮的，無怪乎吳承恩要讓他「長生不老」了。但到了劉以鬯的筆下，唐僧不再為神、為聖，作者是把當他當作人來寫的。是人，便有人性，有人的七情六欲。作品寫他被誘惑的過程，開始時，十世修行的唐僧面對裸體的美女們，還堅守陣地，雖被吊在梁上，仍閉眼默念「阿彌陀佛」；當蜘蛛女妖先是以香味，接著以柔唇向唐僧進攻時，唐僧先是恨她後是想她，再來是心跳加速——聖僧開始動心了！隨著大蜘蛛精越軌動作的花樣百出的誘惑，他逐漸動搖了，在美與惡的十字路口，「和尚的身體孕育了妖精的

心」，被脫去袈裟的唐僧，終於在最後一刻，把心一橫，睜開了眼睛，「看到了從未見到過的部分」。從唐僧的精神衝突中顯示了人性的複雜，塵心戰勝了佛心，信念在誘惑面前徹底崩潰。作家選取唐僧作為描寫對象是有典型性的，這篇故事新篇就新在它從人性的角度體驗人的內在真實，它告訴我們，即使像唐僧這樣的聖僧，虔誠向佛，但他畢竟是血肉之軀，同樣有七情六欲，有感情有人性的。

在香港的物欲大潮中，香港人都處於動盪不安中，承受著某種心理壓力，劉以鬯還著意在金錢支配一切的社會裡，發現人性煥發出來的光輝。《龍須糖與熱蔗》的故事相當簡單，寫亞滔與珠女兩個街頭小販的一段情。亞滔是賣龍須糖的，雖然他的文化水平低，頭腦簡單，但他本性善良，即使在一段時期裡賺的錢不足以維持家裡的開支，他也「不願拿了刀子到公廁搶劫」。與他一起在大廈門前賣熱蔗的珠女，同病相憐，產生了朦朧純潔的愛情，但他們從來沒有互相表白過。一天，一個流氓想調戲珠女，亞滔見義勇為，把阿飛打走了，保護了珠女。作家在日常生活中，思考著這一對勤勞、純真的小人物，展現他們高尚、優美的靈魂，生動地寫出了香港社會底層的貧苦勞動人民的愛憎與苦樂，理想和命運。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山盟海誓，作者將下層人民中互助、同情、見義勇為的美好人性澆注于這一對小人物中。

劉以鬯知道社會生活是複雜的，人性也是複雜的，人性並不僅僅是善與惡。不同的人，對善、惡的因素抱持不同的態度，孟子說：「是非之心，智之端也。」<sup>(5)</sup>這指出，在人的心理活動中總是充滿著是與非、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好與壞之間的較量，這正體現了人性的複雜性。香港是一個欲望的都市，一切物欲、肉欲都在商業之風的煽動下膨脹起來，人性在這樣的環境下也體現出複雜性。這在酒徒身上得到很好的體現，酒徒常常借助酒精而放縱自己，他既與司馬莉、楊露、張麗麗

等女性來往，又與妓女在一起鬼混。但他畢竟是一個純正的文人，良心未泯，在一夜酒醒之後，他出於對年老色衰的妓女的同情，將半個月掙來的稿酬塞到了她的手袋裡，他拒絕了十七歲的少女司馬莉的誘惑，送酒醉的司馬莉回家，這些都顯示了他的內心深處的矛盾衝突。

《黑色裡的白色 白色裡的黑色》形式很獨特，是由一塊塊黑底白字和白底黑字交錯相間的版面所構成，黑底版塊是香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道德風尚的綜合反映，標誌著人性的黑暗的一面，白底版塊寫的是主人公麥祥一天的日常生活，麥祥幫助六叔寄信、攙扶被撞倒的老太婆、為受災後的大陸同胞捐款，人間那種溫情在麥祥一家的身上感受到了，標誌著人性光明的一面，用這種黑白相間的形式印刷不只是給人一種刺激，還告訴讀者：香港是一個美醜、善惡互相滲透、互相交織的複雜的多元社會，人性如社會一樣，也是黑中有白，白中有黑，黑白相間，有誰能說，人性是獨善還是獨惡的呢？劉以鬯不僅看到了人性的複雜性，而且把他的體驗借主人公的活動和特殊設計的黑白相間的排版體現出來，給人深深的思考。

#### 四、劉以鬯生命體驗的形成因素

丹納說：「真正天才的標幟，他的獨一無二的光榮，世代相傳的義務，就在於突破慣例與傳統的窠臼，另闢蹊徑。」<sup>(6)</sup>劉以鬯實驗小說的出色之處，在於他達到了生命深度和靈魂深度，作品所展示的生命體驗足以讓我們每一個讀者閱讀自己的人生歷程，敞開心靈的暗角，接受這種體驗、感知這種體驗。但我們如果作進一步的探討，就會發現這與劉以鬯獨特的人生經歷、香港的人文環境及實驗小說理論的映照是分不開的。在人生經歷方面，劉以鬯閱歷豐富，對社會的觀察、感知善於從生命的角度去思考、去感悟，注意把人生經歷的曲折性與研究生命問題的複雜性聯繫起來；在客觀方面，香港長期受殖民統治，社會紛繁複雜，同時也是人的生存、人生以及人性體

## 文學評論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不得翻印

劉以鬯



版權為作者  
未經批准

驗最複雜的地區，適合於敏感的劉以鬯去體驗，去感悟。「現代生活最深層次的問題來源於個人在社會壓力、傳統習慣、外來文化、生活方式面前保持個人的獨立和個性的要求。」<sup>(7)</sup>

魯迅說過，「作者寫出創作來，對於其中的事情，雖然不必親歷過，最好是經歷過。」他又解釋說：「我所謂經歷，是所遇、所見、所聞，並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裡面。」<sup>(8)</sup>，從生活實際出發，才符合文學來源於生活這條根本創作規律。劉以鬯把藝術創作的根子實實在在地紮在人的現實生命活動及其體驗之中，劉以鬯的實驗小說向世人揭示了他的內心世界，看問題的透徹和敏銳使他在人們的心目中遠遠超越于一般的學者，他執著的個性配合他的靈感和天賦造成了他獨特的生命體驗。

劉以鬯在其自序中提到，他出生在上海，讀初中時便喜歡閱讀文學

作品，到香港後主要從事報紙副刊的編輯，業餘寫作。任何文學文本都是作家人生與其所屬的群體文化經驗的結晶，劉以鬯的超拔之處就在於他以獨具個人特色的生命體驗溝通了共通的文化經驗，並且將這種體驗與經驗用恰當的文本語言表達出來。

劉以鬯在自述中談到「現在，我只是一架『寫作機器』罷了。事實上，即使機器，也需要修理的時候；但在香港賣文，連病的權力也沒有。……為了生活，我已寫了六七千萬字的『垃圾』，每一次別人稱我『作家』，我必臉紅。」<sup>(9)</sup>這是生活在文藝被當作商品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的一位有藝術良知的職業作家的悲哀。所以他在體驗生命的歷程時，著重在文本中就刻意描寫人物微妙的內心變化、內心衝突以及與外部壓力的較量，對人物心理刻畫和靈魂剖析細緻入微，層層進逼，如《寺內》對張生與崔鶯鶯的心理描寫都是用這麼一句話引出來，「牆是一把刀，將一個甜夢切成兩份憂鬱。」他像一個銳利而冷峻的外科醫生，不管縱向從題材如《西廂記》、《雷峰塔傳奇》到現代如《島與半島》，還是橫向的從普救寺、西湖邊到香港的不同時空的轉換，包括情節的發展都成為劉以鬯做心靈分析的手術臺，他將人的情感生活及命運「從普通地位提高到詩意體驗水平並使它獲得表現，使讀者充分意識到他通常回避忽略的東西，從而更清晰地、更深刻地洞察人的內心」。<sup>(10)</sup>

二十世紀的香港由於英國殖民者長期推行殖民主義教育，表面上有言論和寫作自由，實際上英國殖民當局對嚴肅文學是排斥的，因為一般來說，嚴肅文學意味著文化批判，它代表了一種啟蒙精神，葉維廉曾這樣的解釋：「殖民地的教育，在本質上，無法推行啟蒙精神，啟蒙即要通過教育使我們自覺到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所處的情境。這，殖民政府不能做，因喚起被統治的民族自覺，就等於讓他們認知殖民政策控制、鎮壓、壟斷的本質，自覺引向反叛與革命之路。」<sup>(11)</sup>香港採用的是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市場機制十分發達。港英政府不問地將文學置於市場之中，其結果自然就是通俗文學的

發達與嚴肅文學的萎縮。劉以鬯在《酒徒》中就哀歎這個城市的商業性壓力了，「酒徒」在給他人的信中說：「香港的文化空氣，越來越稀薄了，書店裡只有武俠小說、黃色小說、四毫小說、彩色封面而別字連篇的冒牌文藝小說……這些都是商品；而書店老闆皆以賺錢為目的。他們需要的只是商品，不是真正的文學作品。」

也斯在《在香港寫小說》一文中，也談到香港通俗文化從來都是主流，嚴肅文學只能策略性地寄生在通俗性的報刊上，地位十分可憐。在德國文化協會的一次關於「作家的社會責任」的座談會上，劉以鬯的一個發問頗出乎人們的意料：「作家對社會有責任，但社會對作家是否也有責任呢？」這是一個只有香港作家才能提出來的問題，「的確，社會要求作家認真嚴肅地對待創作，寫出推動社會發展、有教育意義、有良好意識而又有藝術性的好作品。在道義上，作家也實在應負這種歷史與社會的使命。但是，反過來，社會對作家又盡過一些什麼責任呢？一個作家，當他生活面臨困境的時候，有誰會去關心他呢？」<sup>(12)</sup>劉以鬯此番談論，道出了香港作家的特定處境。

文化在香港是一種產業，它的生產過程同其他產品一樣，首先瞄準的是市場與利潤，文學的生存事實上已經受到嚴重的威脅。劉以鬯還曾就文學能否繼續生存發表過一次題為《小說會不會死亡》的著名演講。

正是在這樣的人文環境下，劉以鬯對生存以及生命都有了深刻的體驗：「這是一個人吃人的社會，我想。越是卑鄙無恥的人越是爬得高；那些忠於良知的人，永遠被壓在社會底層，遭人踐踏。」在別的國家，一個嚴肅的文藝工作者，只要能夠寫出一部像樣的作品，立刻可以靠版稅而獲得安定的生活。但是，香港的情形就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所謂『文藝創作』，如果高出《青年園地》的水準，連代理商也必拒絕發行。於是，有才氣，有修養，甚至有抱負的作者們，為了生活，無不競寫通俗

小說了。」<sup>(13)</sup>香港社會商業化與高度物質文明使得一名熱愛文藝的作家處於一種精神的困境，所以他結合自己的生命體驗在作品中真實呈現了現代人的這種生存境況，著力展現人物內心的自我糾纏，演繹著在社會與個人、本能與意志、理想與現實的內心衝突。

劉以鬯是致力於小說創新的作家，他的實驗小說理論深受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他在吸收、消化、綜合、改造二十世紀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觀念的過程中，凸顯出人的特點和重心，形成屬於自己的實驗小說理論。他以他的實驗小說解救小說作為一種文體所面臨的危機，他指出：「使小說的地位發生根本性的動搖」，「主要是創作方法」，傳統方法置小說藝術於絕境，尋求新的創作方法將會拯救小說藝術於絕境。「小說死亡的時候，可能也是小說再生的時候」，所以劉以鬯提出：「作為一個現代小說家，必須有勇氣創造並試驗新的技藝和表現方法，以期追上時代，甚至超越時代。」<sup>(14)</sup>

他把文學看作與人生密切關係的一個門類，他認為「小說不但反映人生，也可以視作對人生的解釋」<sup>(15)</sup>，所以他與西方現代小說家一樣，把探求人類的「內在真實」作為他藝術創作的目標，他認為反映事象表面所得的「真實」，終究不是真正的「真實」，在劉以鬯心目中，所謂「內在真實」，即是「人的內心衝突」，是「靈魂鬥爭」，他認為處在這個苦悶的時代，「人生變成了『善與惡的戰場』，潛意識對每個人思想和行動所產生的影響，較外在環境所能給予他的大得多。」<sup>(16)</sup>因而，探求個人心靈的飄忽，心理的幻變，描寫積累在人們內心深處而又不斷地湧現到人們意識表層各種印象，不僅是真正的「真實」，也是小說的長處。他主張描繪自我與客觀世界的鬥爭，表現客觀世界對人內心的壓力以及人在承受這壓力時的「內在感應」。這種「內在感應」也正是內心真實的一個方面，這就離不開作者的生命體驗。

劉以鬯認為過去傳統小說「那種『自根至葉』的單線敘述絕對不能完全





地表現更錯綜複雜的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只有運用橫斷面的方法去探求個人心靈的飄忽、心理的變幻並捕捉思想的意象，才能真切地、完全地、確實地表現這個社會環境及時代精神。」<sup>(17)</sup>劉以鬯提出的小說敘述橫斷面的格局，便要求作家對生命的體驗更有層次、更有深度。

綜上所述，香港全面商品化的浪潮及其相應的文化氣候顯然也要求文學創作的淺俗化與世俗化，有時甚至強調到了粗俗化、實用化和簡單化的層面。而高擎現代主義文學大旗力主實驗創新的劉以鬯，以堅守陣地的同時，也不得不為曲高和寡、艱澀深銳的現代派文學在香港的繁榮發展而遷就這種文化氣候，正是客觀與主觀相結合，並在理論的輝映下，使劉以鬯有了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劉以鬯是一個有著生命自覺的作家，他那窮困潦倒的困境以及不尋常的人生經歷使他的創作具有了直面真正人生的勇氣，以一種開闊的悲憫胸懷始終關注思考著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義，呼喚著人性尊嚴、人生溫暖的生命形態。正是他在這一點上，劉以鬯的實驗小說中對生命的體驗達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這種體驗才獲得讀者的共鳴和久遠的魅力。

### 注釋：

- 1 康少邦、張寧編譯：《城市社會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第112頁
- 2 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第391頁
- 3 也斯：《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青文書屋，1996，第141頁
- 4 佛洛德：《性愛與文明》，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第275頁

5 孟子：《公孫醜上》

6 丹納：《藝術哲學》，安徽文藝出版社，1991，第372頁

7 西美爾著，費勇等譯：《大都會與精神生活》，《時尚的哲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第187頁

8 轉引自《葉紫作人豐收》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219頁，《文學理論基礎》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121頁

9 潘亞暎：《香港作家剪影》，海峽文藝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12頁

10 榮格：《心理學與文學》，北京：三聯書店，1982年，第121頁

11 葉維廉：《自覺之路：由裸靈到死》，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賞》，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1

12 陳浩泉：《作家的社會責任》，《青果集》，中國友誼出版社，1984

13 劉以鬯：《酒徒》，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85，第121頁

14 劉以鬯：《小說會不會死亡》，《劉以鬯卷》，香港：三聯有限公司，1991，第303頁

15 《劉以鬯談創作生活》，《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5頁

16 劉以鬯：《酒徒·初版序卷》，《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63頁

17 劉以鬯：《酒徒·初版序》，《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62-63頁

18 劉以鬯：《酒徒·初版序卷》，《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5頁

19 劉以鬯：《酒徒·初版序》，《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5頁

20 劉以鬯：《酒徒·初版序》，《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5頁

21 劉以鬯：《酒徒·初版序》，《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5頁

22 劉以鬯：《酒徒·初版序》，《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5頁

23 劉以鬯：《酒徒·初版序》，《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5頁

24 劉以鬯：《酒徒·初版序》，《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5頁

25 劉以鬯：《酒徒·初版序》，《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5頁

26 劉以鬯：《酒徒·初版序》，《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5頁

27 劉以鬯：《酒徒·初版序》，《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5頁

28 劉以鬯：《酒徒·初版序》，《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5頁

29 劉以鬯：《酒徒·初版序》，《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5頁

30 劉以鬯：《酒徒·初版序》，《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5頁